

# 吐鲁番元代纸币的发现与早期研究\*

朱玉麒

**[摘要]** 利用古代钱币进行历史的研究,在清代以来的学人中蔚成风气。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元代纸币,有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等,清末在新疆担任官员的王树楠、段永恩等人,都曾通过题跋、仿写的形式进行了研究。通过与史书记载的印证钩稽源流,论证纸币发行的得失,并引发对当时钱币改革的看法,成为最早研究这些纸币的成果。此后黄文弼从回鹘文对中统宝钞的记载,论证了这些元代纸币在西域的流通情况。凡此种种收藏和研究,都为元代纸币的流行提供了实物,为丝绸之路贸易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角度。

利用古代钱币进行历史学的研究,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在清代以来的学人中更是蔚成风气。纸钞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使用,也很早就被学者所关注。丝绸之路上纸钞实物的出现,更是激发了学者在钱币学和西域研究领域的热情。

在吐鲁番,蒙元时期流通的一些纸钞被不断发现。清末民初以来,部分发现得到了学者的记载与探索,为我们今天的系统研究提供了方便。

## 一、吐鲁番发现的元代纸币

### 1、宣统元年发现的“中统元宝交钞”

吐鲁番地区元代纸币的发现,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记载,是王树楠在《新疆访古录》中记录的宣统元年(1909)发现的“中统元宝交钞”(图1)<sup>1</sup>:

曾炳燠云:宣统纪元春正,吐鲁番伊拉里克户民入山采薪,憩于沙磧,水沟石圪,中有绣金绸袱,败絮重叠,隐隐有字。献诸厅署,启视为元世祖中统元宝交钞,棉质,印文漫漶破裂。历年六百,久霾尘沙,今日始得见之。岂因时显露,隐与财政相发明耶?……

右元中统元宝交钞,纸质纯棉,破裂不完,而字迹尚可辨识,印文尤鲜艳如新。其缘即以绣金绸袱裂而饰之,古色照人,洵收藏家所仅见也。

王树楠(楠字多作柎、柎,1851—1936),字晋卿,晚号陶庐老人,河北新城(今高碑店)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光绪三十二年至宣统三年(1906—1911)任新疆布政使,曾主持编纂《新疆图志》,其后又有《新疆访古录》等西域研究专著行世,是在新疆地方文化建设方面贡献最为突出的清代官员。在任期间多方收集并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等文物<sup>2</sup>,上文记载的

\*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疆稀见史料调查与研究”(11&ZD095)成果之一。

<sup>1</sup> 《新疆访古录》卷二,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印本,1919年,叶三〇下至三二下。

<sup>2</sup> 王树楠关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收藏和研究,参拙文《王树楠与敦煌文献的收藏和研究》,《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574-590页;《王树楠的西域胡语文书题跋》,《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元中统元宝交钞”也是这一时期由下属上呈的收藏品之一。文前提及的曾炳燿字筱棠，一作筱棠，湖南湘乡人。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元年期间，任吐鲁番厅同知，曾编纂《新疆吐鲁番厅乡土志》。王树楠旧藏《六朝以来写经残卷》八、《六朝写经残卷》十<sup>3</sup>，即曾氏所赠。文中的纸币发现地“伊拉里克”，即今托克逊县伊拉湖镇，在吐鲁番盆地的最西端，由此西行即进入阿拉沟，为经由西天山腹地通向南北疆和丝绸之路西端的重要通道<sup>4</sup>。直到明使臣陈诚永乐十二年（1414）出使帖木儿帝国，亦经由此条线路，沿伊拉湖而阿拉沟西行<sup>5</sup>。伊拉里克户民入山采薪所见的这一绣金绸袱饰边的中统交钞，正是在这入山而西去的交通道路上，应该是蒙元时期军民路经此地时的遗留物。



图 1、《新疆访古录》“元中统元宝交钞”条书影

元代发行纸钞的情况，《元史·食货志》有详细的记载：

世祖中统元年（1260），始造交钞，以丝为本。每银五十两易丝钞一千两，诸物之直，并从丝例。是年十月，又造中统元宝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

2012 年，128-137 页；《王树楠与西域文书的收藏和研究》，《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1075-1100 页；《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吐鲁番学研究》2012 年第 2 期，69-98 页。

<sup>3</sup> 这些残卷及王树楠题跋，今藏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参《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以下简称《中村集成》），矶部彰编集，东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亚出版文化研究）总括班，2005 年，第 157、159 号，下册 26-31、36-37 页；拙文《王树楠吐鲁番文书题跋笺释》，73-74、78 页。

<sup>4</sup> 伊拉湖镇通向阿拉沟的交通线路，自唐代即为军事要道，参王炳华《阿拉沟古堡及其出土唐文书残纸》，《唐研究》第八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323-345 页。

<sup>5</sup> 参陈诚著、周连宽校注《西域行程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37、55 页。

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其等有五：曰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每一两同白银一两，而银货盖未及行云。五年，设各路平准库，主平物价，使相依准，不至低昂，仍给钞一万二千锭，以为钞本。至元十二年（1275），添造厘钞。其例有三：曰二文、三文、五文。初，钞印用木为版，十三年铸铜易之。十五年，以厘钞不便于民，复命罢印。然元宝、交钞行之既久，物重钞轻。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文。依中统之初，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每花银一两，入库其价至元钞二贯，出库二贯五分，赤金一两，入库二十贯，出库二十贯五百文。伪造钞者处死，首告者赏钞五锭，仍以犯人家产给之。其法为最善。

至大二年（1309），武宗复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元之钞法，至是盖三变矣。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然未及期年，仁宗即位，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遂有罢银钞之诏。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之世，盖常行焉<sup>6</sup>。

如上所载，自中统元年起，蒙元时期曾经发行过中统、至元、至大三种纸钞，前二种一直行用到元代终结。而这些纸钞历年都有印行，《元史·食货志》记载“岁印钞数”的记录直到天历二年（1329），仍印行“至元钞一百一十九万二千锭，中统钞四万锭”<sup>7</sup>。到了顺帝至正年间，使用背面加盖“至正印造元宝交钞”墨戳的“中统元宝交钞”，是中统钞的新钞。因此，王树楠记载的这一中统宝钞，究竟是哪一年印行的，还需要分辨。据《新疆访古录》摹本中的文字可知，纸钞的发行机关是“行中书省”，而目前发现面值“一贯”及以“佰”“拾”相计的至正（1341-1368）以来的中统元宝交钞的情况<sup>8</sup>，都写作“中书省”。根据学者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白塔发现的“壹拾文”纸钞和锦州博物馆藏“贰贯文省”铜版这两种同样标记为“行中书省”的中统元宝交钞的研究，这一类纸钞应该是至元二十四年即1287年行中书省改为行尚书省之前所发行的<sup>9</sup>。此外，在写有面值字样的两边长框中，均有左“中统元宝”、右“诸路通行”字样，而以汉文九叠篆、八思巴文并列者，系至元六年行用八思巴文之后的中统钞；仅书有汉文九叠篆字者，则为此前的早期中统钞。就《新疆访古录》上的摹本来看，两侧边框中的文字没有描摹出来。但是目前的长方框中间并没有分栏，很有可能是汉文九叠篆单独书写的至元六年即1269年之前物。所以王树楠的文中所言“历年六百，久霾尘沙，今日始得见之”，只是一个虚数。实际从它的制造到这一纸钞包袱被发现的宣统元年，至少已经有了640年的时光了。

从《元史·食货志》的记载可知，中统元宝交钞一共有9种面值<sup>10</sup>，王树楠记载的“贰贯”

<sup>6</sup> 《元史》卷九三《食货》一，2369-2370页。

<sup>7</sup> 同上注，2373-2374页。

<sup>8</sup> 参内蒙古钱币研究会等编《中国古钞图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彩2、3，39-53页。

<sup>9</sup> “壹拾文”纸钞，图版见《中国古钞图辑》54页；研究论文参卫月望《壹拾文中统元宝交钞考说》，《中国钱币》1985年第4期，38-40。锦州博物馆藏“贰贯文省”铜版，图版见《中国古钞图辑》，135页；研究论文参那荣利《“中统元宝交钞贰贯文省”钞版考》及编者按，《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一辑，2002年，63-65页。

<sup>10</sup> 中统钞面值向有10种、9种之说，1986年宁夏贺兰县拜寺口双塔发现“中统元宝交钞叁伯文”面值，可证中统钞有10种面值说为是。参《中国古钞图辑》，53页。

是面值最大的一种“大钞”，也是目前所知发现的唯一一件，因此弥足珍贵<sup>11</sup>。因为照相制版的技术在当时还没有普及，除了文字描述的尽量详细之外，王树楠使用了描摹的方式予以存真。与后来出土的类似实物对比，除了正面“贰贯”两边栏中的文字、钤印以及钞背情形未能得到表现外，这一描摹图基本保存了中统钞的各种元素。其中“寓字料”、“育字号”是以千字文为序列的纸钞编号。在图版的左上方，作者还标记了宝钞的尺寸：“按原图以虑僂尺量，长一尺四寸五分，宽一尺一分。”虑僂尺是东汉章帝建初六年（81）确定的度量标准，因此宝钞的尺寸以一尺相当于23.5厘米换算，则为长34.1、宽23.7厘米<sup>12</sup>。根据《新疆访古录》中有关文书的叙录文字多由其收藏品题跋抄录修订而成的写作方式，王树楠收藏中统元宝交钞也是将原件、摹本装帧成册，前后题记，最后成书。王树楠1911年由新疆东归后，收藏品先后变卖，今分藏在中国和日本各地的公私藏家手中<sup>13</sup>，因此，其中统元宝交钞的原册或许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还留存人世。一旦发现，则我们将看到真正的早期中统元宝交钞最大面值的“贰贯文省”原貌。

## 2、宣统三年发现的“至元通行宝钞”

此后不久的宣统三年，梁玉书又获得了“至元通行宝钞”（图2）。它的发现经过，被段永恩在题跋中揭示出来：

宣统纪元春正月，吐鲁番伊拉克户民入山采薪，憩于沙磧，水沟石圪，中有绣金缎袱，败絮重叠，隐隐有字。献诸厅署，启视为元世祖中统元宝交钞，棉质，印文漫漶破裂。曾筱棠司马分贻新城方伯装池。辛亥秋，清理财政局梁素文监理又得至元通行宝钞，与中统为一时之物。恩为照仿一式，惟“赏格元宝”下数字磨灭，余皆真切。历年六百，久霾尘沙，今日始得见之，岂因时显露，隐与财政相发明耶？……

素文观察监理财政有年矣，其于古今中外之利病，早已洞悉于中。今以至元通行宝钞命题缘起，爰考证之如此，不知有当一二否？武威段永恩敬识。（首钤“山高月小”白长方，末钤“永恩”白方、“季承”朱圆印）

段永恩（1875-1947），字季承，甘肃武威人。光绪三十三年以“举贡考职”中式，分发新疆即用知县，参与了王树楠《新疆图志》的编纂，民国以后历任新疆地方知县等职，著有《养拙斋诗草》。作为王树楠的在甘肃速成师范学堂的学生与后来新疆的僚属，段永恩在新疆也参与到了收藏和研究吐鲁番文书的行列中，他的题跋“除了部分是接受了王树楠品评的精义而另为笔墨外，更多是直接抄录王树楠的题跋内容，甚至到了亦步亦趋的地步”，这一点被笔者概括为“祖述陶庐、新知未广”<sup>14</sup>。上面的题跋论述王树楠所得中统元宝交钞的经过，可以看到确实就是王树楠《新疆访古录》的抄录。而“伊拉里克”也被夺写做了“伊拉克”。

题跋中论及的“清理财政局梁素文监理”即梁玉书，字素文，奉天新民（今属辽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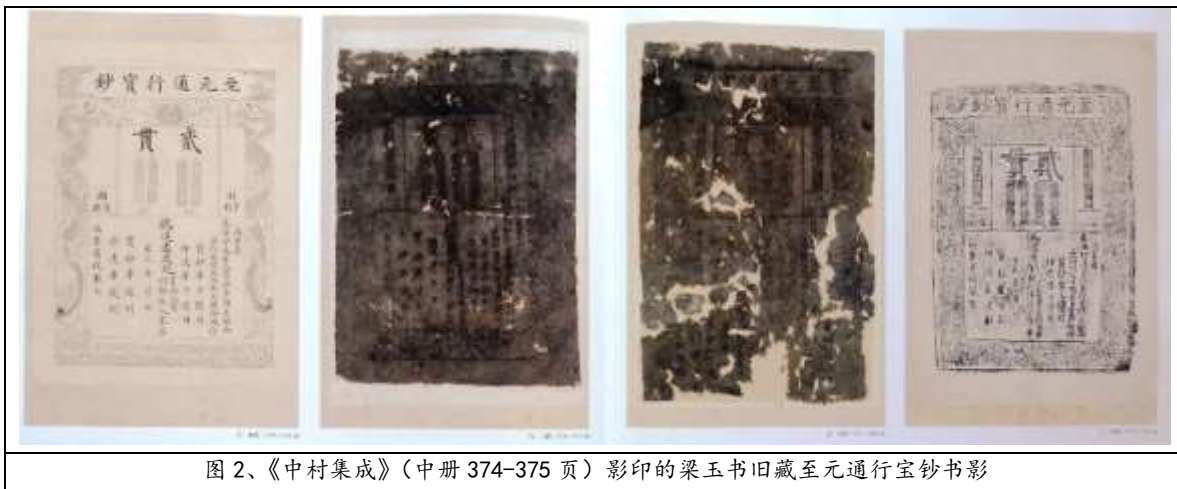
<sup>11</sup> 参《中国古钞图辑》，133-134页。

<sup>12</sup> 《新疆钱币》图录影印此摹本，标记尺寸为239.3×343.4毫米，系以杨宽考证虑僂1尺为236.8毫米比率换算者，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香港：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1年，12、193页。

<sup>13</sup> 流散情况，参注2笔者有关王树楠旧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

<sup>14</sup> 段永恩的相关研究，参笔者《段永恩生平考略》、《段永恩与吐鲁番文献的收藏和研究》二文，待刊。上引文见后者。

宣统元年任新疆监理财政官。他也非常热中吐鲁番文书的收集，并遍请迪化文人王树楠等为之题跋，段永恩也是为他题跋较多的学者之一。梁玉书在乌鲁木齐的收藏均来自吐鲁番，所以，虽然这两枚面值“貳贯”的至元通行宝钞没有交代来源，对于段永恩来说，既然提及了来自吐鲁番的王树楠收藏品，梁玉书收藏品的来历也是不必赘言的。因此，由吐鲁番发现而被呈送给梁玉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元史·食货志》记载的至元通行宝钞一共有 11 种面值，梁玉书获得的“貳贯”也是其中最大面值的至元钞。同样面值的纸钞出土数量很多，最早的记载是科兹洛夫考察队 1908 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遗址所得<sup>15</sup>，此后陆续发现了不少<sup>16</sup>。而梁玉书 1911 年所得也是早期发现品之一，只是由于这一重要的文物后来出售到了东瀛日本，秘藏多年，直到 2005 年《中村集成》的出版，才得以重光人世。

《中村集成》公布的梁玉书收藏品中，除了至元钞原件外，也保留了段永恩的摹写品，基本保留了原钞的内容，但是八思巴文的“至元宝钞”、“诸路通行”也没有摹写出来，关于伪钞的条例文字“首告赏银伍定”也因模糊不清而写作“赏格元宝”云云。

《中村集成》在至元钞原件起首处，另外还粘贴有一件至元钞，似乎是从一个钞版上拓下来的，这里的伪钞条例文字非常清楚。对照罗振玉《四朝钞币图录》，这个拓本与图录第六件“元至元貳贯钞铜版”完全一致<sup>17</sup>。图录的目录注明这个铜版为“上虞罗氏藏”，也就是罗振玉本人所收藏。因此，《中村集成》中的拓本是梁玉书由新疆回到内地后，由罗振玉本人或者经由他人赠送的罗氏藏版拓本。这样，之前段永恩的摹本也就无法参考到这个字迹清晰的拓本，而给临摹留下了遗憾。

《中村集成》出版时，也公布了对这些图版的丈量尺寸，兹抄录以供后来者参考：钞版拓

<sup>15</sup> 《中国古钞图辑》，57 页。相关记载，参彼·库·科兹洛夫著，王希隆、丁淑琴译《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83 页。

<sup>16</sup> 庞文秀《黑城出土元代纸币及其流通状况概述》，《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文集》第七辑，2006 年，86：3-7 页。

<sup>17</sup> 罗振玉《四朝钞币图录》，1914 年上虞罗氏永慕园丛书原钱影印本；此处据罗振玉著、罗继祖主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六集排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292 页。

本：27.2×19.6 厘米；比较破碎的宝钞：33.1×22.4 厘米；比较完整的宝钞：30.8×22.5 厘米；段永恩摹本：30.8×23.5 厘米。不过，段永恩的题跋也没有对纸币正反面的印戳作出描述，这些粘贴、装裱起来的纸币背后的信息，目前也还无法领略。

### 3、1928 年发现的“至元通行宝钞”

如果说清末中国学人的吐鲁番文物收藏和研究还是属于传统古董学的范畴，那么 1928 年黄文弼（1893-1966）先生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则是中国学人在西北地区以现代考古学的理念进行的第一次科学考察和研究。黄文弼作为此行唯一的中国考古学者，也在吐鲁番的考古活动中采集到了两件“至元通行宝钞”（图 3）。《吐鲁番考古记》记录这些纸钞云：

此残钞二件。一九二八年，在吐鲁番采集。今择其完整者录入。高三〇厘米，宽二二厘米。上额有“至元通行宝钞”六字，花栏内上半中为“貳贯”二字横书，下有钱文两串，每串拾百制钱，表示此钞两贯值制钱两千文。左右为蒙文，右下汉文“字料”二字，左下有“字号”二字，均横列。下截为通行宝钞令敕和印造机关。原件字颇模糊，今参考《四朝币制》释之。文云：……<sup>18</sup>

黄文弼先后四次到新疆考察，据《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的记录，黄文弼的第一次西域考察，先后三次到过吐鲁番<sup>19</sup>。第一次是 1928 年 2 月 21 日到 3 月 1 日，前后 10 天；第二次自 1928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10 日，前后 18 天；第三次是 1930 年 2 月 24 日至 4 月 7 日，共 44 天。《吐鲁番考古记》言纸币是 1928 年所采集，而在 1928 年的两次吐鲁番考察中，黄文弼在日记中都有从民人手中购取文书经卷的记录，但并没有确切记录哪天购得纸钞，可见当时也没有来得及作详细的分辨，因此我们至今尚不能判断这一采集品的具体来历。

虽然有关纸钞的考古信息无法复原，《吐鲁番考古记》还是详细描述了纸币的形状，并通过《四朝币制》录出了原本模糊的伪钞条例文字内容。《四朝币制》即前引罗振玉《四朝钞币图录》，其中的第二卷是“四朝钞币图录考释”<sup>20</sup>。也许因为钞币漫漶的缘故，黄文弼也没有记载这一纸钞背后的情况。

虽然有关纸钞的考古信息无法复原，《吐鲁番考古记》还是详细描述了纸币的形状，并通过《四朝币制》录出了原本模糊的伪钞条例文字内容。《四朝币制》即前引罗振玉《四朝钞币图录》，其中的第二卷是“四朝钞币图录考释”<sup>20</sup>。也许因为钞币漫漶的缘故，黄文弼也没有记载这一纸钞背后的情况。



图 3、《吐鲁番考古记》图版 53 图 58 刊布的至元钞

<sup>18</sup>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 年，50 页。

<sup>19</sup> 黄文弼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164-171、180-190、514-531 页。

<sup>20</sup> 罗振玉《四朝钞币图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六集，313-315 页。

## 二、吐鲁番元代纸币的早期研究

以上由王树楠、段永恩、黄文弼记录的吐鲁番发现的元代纸币，不仅在题跋或考古记中做了详细的描述和摹图存真、影印制版等保存方式，同时，他们还都对这些纸币作了初步的研究。

### 1、王树楠的研究

王树楠的《新疆访古录》在上引文的省略号处有如下文字：

按，宋高宗时，金始设印造钞引及交钞库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等，谓之大钞，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谓之小钞，与钱并用。诸路并设使、副、判各一员，都监二员，盖以铜少，为权宜之制。理宗时，蒙古立十路宣抚司，示以条格，行中书省造中统元宝交钞，立五市于颖州、涟水、光化军，其法自十文至二贯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诸路通行，赋税并听收受，仍申严私盐酒醋麹货等禁。元世祖二十四年，更造至元钞自一贯至五十文，凡十有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视中统钞五贯文。盖交钞初造，虚实相权，行之既久，轻重悬殊。立法行政，与时变通，是又权食货者所当引古为鉴也。

《元史·食货志》：世祖中统元年，始造交钞，以丝为本。十月，又造中统元宝交钞。其文以十计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计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贯计者二，曰一贯文、二贯文。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行之既久，物重钞轻。至元二十四年，遂改造至元钞自二贯至五文，凡是一等，与中统钞通行，每一贯文当中统钞五贯文，伪造者处死，首告者赏银伍锭，仍以犯人家产给之。至大二年，复以物重钞轻，改至大银钞，自二两至二厘定为一十三等，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元之钞法至是盖三变，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至大钞又五倍于至元。未及期年，仁宗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遂有罢银钞之诏。而中统、至元二钞，终元之世，盖常行焉。

以上的叙述，当自正史归纳，最重要的依据是《元史·食货志》，因此作者整段抄录了这一史料。作为新疆布政使的王树楠不愧为掌管一省财赋与民政的大吏，对于历史上的钱法非常熟悉，因此在面对元代的宝钞所写的题跋，引经据典地说明从金代以来中国出现纸币的渊源，以及中统宝钞在元代的流行情况。

王树楠的题跋还对自己在宣统元年获得元代纸币而感叹“因时显露，隐与财政相发明”。这个原委，在其晚年编纂的《陶庐老人随年录》“光绪三十四年”条下有所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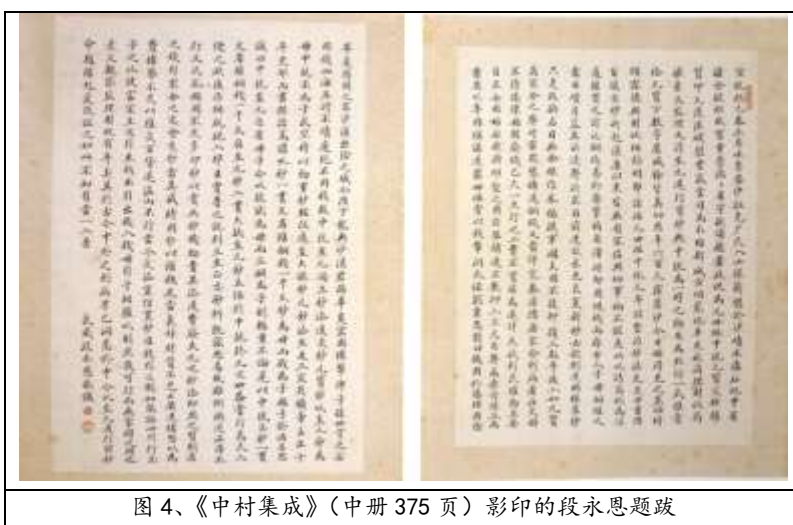
新疆每岁协饷二百万，近年腹地诸省自顾不暇，来者日希。……而岁岁观人朵颐，不谋自立，将来必至坐困。余拟开财之源，次第兴作，然必先筹出三四百万，方能入手进行。于是试办纸币一百万两发行通省，商人不但乐从行使，且人人居奇，奉为至宝。久之，纸币百两易换实银至一百二十两。……余所造百万纸币至今仍照常行使，与民国以后所制之

币贵贱有天渊之别。其行与不行，在乎信与不信，无他术也<sup>21</sup>。

从上文可知，王树楠为了改变新疆依赖协饷而受到牵制的落后财政局面，于光绪三十四年起推行纸币，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所以一年后，在吐鲁番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纸币最为成功的元代中统宝钞，他的喜悦是可想而知的。王树楠在货币改革方面，有完整的理论<sup>22</sup>，因此会在新疆进行有效的货币改革，其中纸币的推行就是成功的例证<sup>23</sup>。而从以上的题跋可知，他确实在货币流通的问题上有过一番对中外古今历史沿革的摸索和研究<sup>24</sup>，因此对于元代中统、至元钞的轻重变化，才会发表“立法行政，与时变通”的引古鉴今感慨。

## 2、段永恩的研究

段永恩的长篇题跋在上引文的省略号处有如下论述（图4）：



谨按，元世祖中统元年，诏整治钞法。先是，中书传旨，议：“交钞所起，汉唐以来皆无，自宋绍兴初，军饷不继，造此以诱商旅，为沿边采买之计，比铜钱易于赏擎。稍有滞碍，即用现钱，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见良策。新钞必欲创造，用权旧钞。只是改

换名目，无金银作本，称提军国支用，不复抑损，三数年后，亦如元宝矣。宋金之弊，所当殷鉴。铸造铜钱，又当详究。秦汉隋唐宋金利病，著在史册，不待缕陈。国朝废钱已久，一旦行之，工费不赀，非为远计。大抵利民权物，其要自不妄用，若欲济邱壑之用，非惟铸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属桑奇谋立尚书省以专国权，议遂罢。

世祖尝以钱币问太保刘秉忠，对曰：钱用于阳，楮用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湿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沙漠，君临华夏，宜用楮币，俾子孙世守之。若用钱，四海且不靖。遂绝不用钱。故中统、至元间，立钞法，造交钞、元宝钞，以至元钞为母，中统交为子。武宗时，以物重钞轻，改造至大银钞。元钞法至是三变矣。

顺帝至正十年，吏部尚书偓笃请以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钞为母，而钱为子。

<sup>21</sup> 王树楠《陶庐老人随年录》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68-69页。

<sup>22</sup> 具体的表述，体现在由其主持编纂的《新疆图志》卷三四、三五《食货》三、四“钱法”中，迪化：新疆通志局，1911年活字本。

<sup>23</sup> 参张新革《试论王树楠的货币思想及造币活动》，《新疆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38-43页。

<sup>24</sup> 王楠《伯希和与裴景福的交往：以中法学者有关敦煌藏经洞最初研究为中心》记载了1907年作为王树楠幕僚的裴景福多次向经停乌鲁木齐的法国学者伯希和了解欧洲法律、税率的问题，“裴景福之所以会对经济问题感兴趣，大致与他协助王树楠处理新疆税收和金融事务有关”。文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十一卷，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等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427—450页。



国子祭酒吕思诚曰：“中统、至元，自有母子，今以故纸为母，而立铜为子，则轻重不伦。”遂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钞二贯。大抵至元钞五倍于中统。终元之世，盖尝行焉，民亦便之。厥后丞相脱脱入邪臣贾鲁之说，别立至正交钞，料既窳恶易败，难倒换，遂涩滞不行。及民乱，国用不足，多印钞以赏兵，钞贱物贵，其法遂废。

夫元之钞法，即周之质剂，唐之钱引，宋金之交会。交钞当其盛时，用钞以权钱。及当衰叔，财货不足，止广造楮币以为费。楮币不足以权变，百货遂涩而不行。当今变法，宜仿置钞准钱引之制，如张咏四川行交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钱出，引出钱入，钱母引子，相权以制，庶几可行，而无窒碍之理也。

段永恩以上的记载，也主要撮抄了传世文献中有关元代纸币流通的材料。如开篇第一则据《元史·刘宣传》，是刘宣事，但题跋写作“中书传旨，议交钞所起”，《元史》原文当作“（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中书传旨，议更钞用钱，宣献议曰：原交钞所起”<sup>25</sup>，这个夺漏使得献议的时间和人物都错失了，下文的“桑奇”也是“桑哥”之误。第二则关于元世祖与刘秉忠的对话，则见于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sup>26</sup>；第三则吕思诚对偃哲笃的争议，也从《元史·吕思诚传》改写<sup>27</sup>。

段永恩是由传统科举而转向近代经世新学的考试进入仕途的，他在光绪三十三年参加的“举贡考职”试卷内容被保存下来，其中就有《单税及复税学说纷如究以何种制度为优试详其说》的试题<sup>28</sup>，可见科举罢停后他在甘肃速成师范学堂中学习过具有实用性的经济之学，因此得以优异成绩获得新疆即用知县的机会。除了熟悉元史纸币流通过程的这些掌故外，段永恩也对纸币发行的物钞轻重抱有警惕，因此会提出“当今变法，宜仿置钞准钱引之制”的观点。

段永恩也引用了王树楠的原话“岂因时显露，隐与财政相发明耶”来称道至元通行宝钞的获得，可见当时王树楠在新疆的币制改革确实影响甚广。同时，题跋还对宝钞的拥有者梁玉书进行了恭维，云：“素文观察监理财政有年矣，其于古今中外之利病，早已洞悉于中。”似乎也是希望梁玉书对于新疆纸币的通行能够给予积极性的指出。但实际上，彼时代表中央政府的梁玉书下放新疆为财政监理，对地方财政起到了掣肘的不良作用。据《陶庐老人随年录》“光绪三十四年”条记载：

欲上书度支部请再造纸币二三百万，以后可以永不仰给岁协，而司农置之不理。又派监理官梁玉书采督财政，事事掣肘，不顾大局，不第纸币不准增造，且欲将已行有效之币收回。至问理财之方，则懵然而不知所措<sup>29</sup>。

宣统元年，清政府颁布《奏定清理财政章程》，在中央设立清理财政处，各省设清理财政局，

<sup>25</sup> 《元史》卷一六八《刘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3952页。

<sup>26</sup>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26页。

<sup>27</sup> 《元史》卷一八五，4250页。

<sup>28</sup> 段永恩、段维新《会试考卷》，甘肃省图书馆西北文献中心藏，编号573·332/179·0893。相关论述，参拙文《段永恩生平考略》待刊。

<sup>29</sup> 王树楠《陶庐老人随年录》卷下，69页。

由度支部（1906年由户部改称）分遣专任监理财政官赴各省督同清理，并鼓吹各省布政使归其管辖，实行财政集权。梁玉书即由此时担任了新疆省的监理财政官。虽然王树楠与梁玉书是吐鲁番文书收集的同道，个人之间的私交似乎也不错<sup>30</sup>，但由于中央与地方利益的不一致，造成他与王树楠之间的政见齟齬是无法避免的。

综观以上的研究，无论是王树楠还是段永恩，都是熟读中国历史文献的学者，因此对中统钞与至元钞的来历以及在元代行用的利弊，有着清晰的认识。同时他们的辨析也都立足于晚清新疆新政中币制改革的立场，使得这一研究与时事相印证，具有了现实意义。

### 3、黄文弼的研究

黄文弼在民国年间的吐鲁番发现的至元通行宝钞，除了在《吐鲁番考古记》中给予科学描述外，也写下了研究的考证文字：

按，《元史·食货志》云……据此，是至元宝钞为至元二十四年以后所印行。至元钞与中统钞比率，则为前者五倍于后者。钞文称“尚书省提举司”，据《元史》八十五《百官志》：……此钞称尚书省，盖为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之间所印。又有“宝钞库”、“印造库”等官名者，据《百官志》云……以上职官均附属于户部尚书。此钞所列官衔，有“宝钞库使副”、“印造库史副”，与《元史·百官志》合。唯“宝钞库子攢司”、“司印库子攢司”乃因沿金源“兴定宝泉”格式。彼作“宝泉库子（押）攢司（押）”、“印造库子（押）攢司（押）”（《四朝币制》释五）。据《元史·百官志》，在印造盐茶等引局条下称：“至元二十四年，仍置攢典库子各一人。”（同卷页十三）是元朝置“攢典库子”各一人，惟不见置“宝钞库子攢司”明文。按，《元史·叶李传》：“至元二十四年，李始定至元钞法。”（卷一七三，十六）是至元宝钞格式，定于叶李。今至元钞与金交钞式样多相同，是叶李窃用金交钞式样以献之元者，故攢典库子犹用金交钞旧称也。吐鲁番在九世纪以后，虽属于畏兀儿，但在元时仍通行中国钱币。根据库车出土畏兀儿文卖地契，经冯家昇先生译出。文云：“我为了需要在大都通用的钞币，我把我女婿他拨迷失园地卖与法苏都，言明中统宝钞八十錠云。……”（见古维吾尔文说明）可证中统宝钞在畏兀儿国为人民通用钱币，则至元宝钞亦为畏兀儿人所通用，可无疑也<sup>31</sup>。

黄文弼以上的考证，除了继续引用《元史·食货志》和《百官志》的资料考证至元钞与中统钞之间的比率之外，还探究了所发现的至元钞币的印行时代、钞币上的官衔来历。他还利用了罗振玉的《四朝钞币图录》的释文，对叶李窃用金交钞式样而为元代交钞格式的过程进行了揭示。此外，更重要的是，他根据冯家昇先生对库车出土畏兀儿文卖地契的译文和研究<sup>32</sup>，论证

<sup>30</sup> 王树楠《陶庐诗续集》卷四至卷六有《次韵张仲清送梁素文之新疆清理财政》、《题梁素文小影》等交游诗，更有为梁玉书收藏文书题写之《题素文所藏六朝画像四首》、《题高昌所得唐人写经残卷》、《素文所得唐人画佛，仅佛头尚完好，余皆断烂，属题》、《题素文六朝写经卷》、《题素文六朝写经二首》诗作；其他见于书道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机构的梁玉书旧藏吐鲁番文书，其中9卷上有王树楠的题跋多达18则。相关论述，参笔者《王树楠与西域文书的收藏和研究》，参注2。

<sup>31</sup>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50-51页。

<sup>32</sup> 冯家昇《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原刊《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119-131页；后收入《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415-429页。

了元代纸币在畏兀儿地区的通用情况。这些研究，无疑使元代纸币的特点以及在西域流通问题得到了深入。

### 三、小 结

综上所述，晚清、民国的学者，对于在吐鲁番早期发现的元代纸币，都怀着浓厚的兴趣进行了研究。这些成果，可以概括为：

1. 通过文字记录和图画摹写的方式，力求科学地著录了纸币的形制；
2. 以史书记载与出土纸币互相印证，钩稽了元代纸币的源流；
3. 论证纸币发行的得失，并引发对当时钱币改革的看法；
4. 据出土文书的记载，论证元代纸币在西域的通行情况。

元代纸币的流行，曾经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被大书特书。他用专门的章节，描述忽必烈时代纸币的印造机构、印制用纸、印造面值、无限通行、旧钞倒换等等状况。其中提及：“既用上述之法制造此种纸币以后，用之以作一切给付。凡州郡国土及君主所辖之地莫不通行。臣民位置虽高，不敢拒绝使用，盖拒用者罪至死也。”<sup>33</sup>这一流通元代纸币的“君主所辖之地”，自然也包括西域地区。这一点，在中国历史的记载中，也是有清晰的认识的。柯劭忞《新元史》的记载最有说服力：“（至元十七年）立畏兀儿交钞提举司。先是，至元九年，立和林转运使兼提举交钞。至是，畏兀儿亦置提举司。二十年。又立畏兀儿交钞库，盖钞法通行西北边矣。”<sup>34</sup>畏兀儿交钞提举司、畏兀儿交钞库的相继建立，说明了钞币需求量在西域地区的迅速扩张。

过去，因为大量元代纸币的出现主要在以额济纳旗为主的内蒙古地区，因此蒙元史研究对于钞币的关注点也主要集中在中国北方地区。因为王树楠藏品只是以摹本的形式面世，而黄文弼发现至元钞相同币种在黑城出土数量巨大，所以吐鲁番出现元代纸币的现象，作为个别的例证往往不忽视，最多是被附着于蒙古地区元代纸币史的研究中。

现在，当我们充分认识了王树楠中统钞出现吐鲁番盆地通向西方的交通要道上的重要性、认识了黄文弼就畏兀儿文卖地契对西域流通纸币论证的重要性，以及梁玉书旧藏至元宝钞的重现人世，更加上吐鲁番博物馆解放以后征集到的另一枚至元通行宝钞“贰贯”的出现<sup>35</sup>，使我们看到元代纸币在西域流通的历史，正在形成一个系列的考古场景，提供着丰富的实物佐证。如何将吐鲁番发现的纸币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接续起来，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 The Discovery and the Earlier Studies of Paper Money of the Yuan Dynasty Unearthed from Turfan

Zhu Yuqi

<sup>33</sup>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240页。

<sup>34</sup> 柯劭忞《新元史》卷七四《食货》七“钞法”条，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174页。

<sup>35</sup> 该宝钞图版见《新疆钱币》图录，12页；李萧主编《吐鲁番文物精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185页；研究论文参杨文清、张永兵《吐鲁番博物馆馆藏至元通行宝钞》，《新疆钱币》2007年第4期，39-41页。

Scholars of the Qing Dynasty tended to solve historical problems by using information getting from ancient currencies, which was a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 at that tim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officers of Xinjiang province such as Wang Shu'nan and Duan Yong'en researched on the paper money of the Yuan Dynasty found in Turfan including "Zhongtong Yuanbao Jiaochao", "Zhiyuan Tongxing Baochao", etc. and they wrote prefaces, postscripts and copies about these paper currencies. By comparing with historical records, they argued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issuing paper money and triggered new opinions about the reform of currency, which became the earliest results of researches on these paper money. After that, referring to records about "Zhongtong Baochao" in Uighur documents, Mr. Huang Wenbi argued the circulation of these paper money in the Western Regions. All these verified that the paper money had been popular in the Yuan Dynasty and provided new angles for the study of the trades on the Silk Road.

(本文原刊《古代钱币与丝绸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吐鲁番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吐鲁番学研究院、吐鲁番博物馆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3月，97-107页。)